读史札记

袁昶、许景澄“庚子三疏”问题再检讨

朱家英

庚子事变中，袁昶、许景澄被清廷处死，时人追论原因，多指二人曾三次联衔疏谏剿拳和洋，因而触当政之怒。其后，疏稿经报刊登载，[①] 遂流布天下，各家著述均据此记录，袁、许二人上疏之事几成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袁、许三疏稿刊载未久，即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高枬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初七日日记中说：

> 石生知茂在，赶来，讲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石生又以为，徐氏言袁一日曾在伊门求见九次，既求见之，必不劾之。[②]

此后史学界亦屡有论及，对于袁、许二人究竟有无写作奏疏，及有无真正呈递等问题，均意见纷纭。诸家观点大体可归纳为四种：

（一）认为第一疏为真，第二、三疏为伪作。除上述高枬日记外，尚有近人戴玄之《义和团研究》附录一《许袁三疏真伪辨》，认为第一疏为真，且已入奏，而第二、三疏为伪作；陆玉芹《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认为第一疏为真，但并未入奏，第二、三疏为伪作。[③]

（二）认为袁昶确有写作三疏之事，但均未呈递。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外传太常有谏止信拳开衅三疏，或云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④] 又章梫宣统间供职史馆，在写作国史传稿《袁昶传》时，曾有所考证，进而否定其事：

> 三忠授命后，海内传袁忠节三折稿甚著，……余在史馆覆纂许文肃传，即据以辑录。追覆纂袁忠节传，初辑者备录三折，顾亚蘧前辈瑗覆纂，删其后二折，签云：“实未入奏。”余又遍

[收稿日期] 2021-09-14
[作者简介] 朱家英（1985— ），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zhujiaying2006@126. 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教改革视域下近代中国文学教育的转型研究（19EZWB013）”编译阶段性成果。

① 当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清议报》第六十期载《袁爽秋京卿请剿拳匪第一疏》，随后天津《直报》和《北京新闻汇报》于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连载了三疏全文。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 年，第 220 页。

③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3 页；陆玉芹、李荣庆：《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史学月刊》2007 年第 5 期。

④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51 页。

> 查军机、内阁奏事处各档，五月以后，七月初三日以前，实无袁忠节折件。许文肃有二折，亦均言他事。则袁之第一折亦未入奏者，因并删之，兼删许文肃传与袁合疏之事。……则三折之未入奏，益无疑义矣。①

（三）认为三疏皆伪。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者》一文论及袁、许三疏，指为他人作伪，嫁名袁、许，其目的在于为荣禄开脱罪责。孔祥吉《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一文也认为三疏皆未曾呈递，并将其视为伪作。②

（四）认为袁、许二人仅上两疏，并未有第三疏。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云："昶初召对，即言拳匪当痛剿，退又两上疏力争，故尤为载漪所恨。"③ 又《申报》刊文《论许侍郎袁京卿奏请剿办拳匪事》称："两公先后两疏……读之犹生气凛凛也。"④

考察诸家论述，固然言之凿凿，各自成理，但仍有忽略不及之处，因此关于袁昶、许景澄"庚子事变"中是否上疏以及"三疏"的文本真实性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的空间。

二、袁昶、许景澄联衔上疏的可能性

否认上疏成立的最大的证据，即如章梫所云官档中没有袁昶和许景澄递交奏折的记录。其后孔祥吉、陆玉芹等人也均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随手登记档》《早事档》《议覆档》中翻检而无所获，⑤ 遂对袁、许上疏之事存疑。但是，官档中没有记录，是否便能否认这一事件存在？清制尽管已经非常严密，各种意见的传达都有完整流程，但仍不能排除例外的发生。胡思敬就曾记载庚子事变中辅国公载澜奏请处死军机大臣王文韶，为荣禄所尼之事，奏疏同样不见于官档。⑥ 可见呈递奏疏，尤其是特殊时期的密奏，未经正常程序而通过其他渠道上递也并非绝无可能。那么，当时在总理衙门任职的袁昶、许景澄，究竟有没有临危上疏的可能？从袁、许二人的任职情况、性格特点、所处环境来看，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尽管多达十余人，但真正熟悉外交并负责具体业务的，主要是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廖寿恒作为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其日记所载历次入署会议的主要人员就是徐、许、袁等人。⑦ 其中许景澄是尤为倚重的对象。徐用仪在致吕海寰书信中说："枢廷之不兼总署者，又不深悉此中情形……弟滥竽其间，无能为役，而又不便告退，赖有许竹筼偏劳一切。"袁昶在写给吕海寰的信中也说："译堂筼兄少宰主持一切。"⑧ 因此，在御前会议上，光绪帝由于许景澄外交经验丰富而专门询问其意见。藉此机会，许景澄、袁昶二人皆恳切直言拳民宜剿，外衅不宜开，不尽然是对于我弱彼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实也是出于维护邦交的职责所系。

---

① 章梫：《一山文存》卷三，民国七年嘉业堂刊本。

② 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者》，《燕京学报》1940 年第 27 期；孔祥吉：《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史学月刊》1991 年第 2 期。

③ 小山重信（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民国十二年抱冰堂刊本。

④《论许侍郎袁京卿奏请剿办拳匪事》，《申报》1901 年 3 月 17 日。

⑤ 孔祥吉：《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第 138 页。

⑥ 胡思敬：《国闻备乘》"荣禄权略"，中华书局，2018 年，第 202 页。又钱恂《金盖樵话》卷四注语与此略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9 页。

⑦ 单士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年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2 期；廖寿恒：《抑抑斋日记》，张剑、郑园整理：《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中华书局，2019 年。

⑧ 徐用仪：《致吕海寰书》，《庚子浙中三忠手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袁昶：《致吕海寰书》，《庚子浙中三忠手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

其次，从袁昶的性格及经历来看，他出身寒微，历任多差，但均能做到尽忠职守。光绪六年，他不过是小小的户部主事，但鉴于当时中俄交恶而致信外家，请事急来京迎取家眷南返避乱，而自己则愿独自留京，“虽未有官守言责……亦复谊不忍去”。[①] 光绪十一年中法天津议和，他作为随员参与缔约过程，返京后即上书总署言新约流弊，力陈应行改议之处。[②] 光绪二十三年在芜湖道任上，朝廷下诏求言，他又写了万言条陈，痛论时弊。可见，袁昶本人一直有着尽忠王事的信念，他本人也一直以忠而身死的于谦当作为官的榜样。[③] 光绪帝对他的器重也不同寻常，半年内四次升迁，时人视为“异数”。[④] 对于袁昶而言，自然对皇帝感激涕零，其《八月初六日召对恭述》诗云：“小臣何以酬恩遇，敢效元城苦口砭。”以忠正任事的刘安世自期，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己亥建储，光绪帝的帝位岌岌可危，他便借给荣禄贺寿之际，赠诗云：“绛侯自握安刘算，不使郊祠匕鬯惊。”[⑤] 讽谏其应维持大局，保护光绪帝。因此，在预感到国家及皇帝将有危难之时，他认为直言极谏是忠臣的本分，故对儿子允棣等人称：“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汝能留京回南，自主可耳”，[⑥] 做好了奋力一搏的思想准备。

最后，从他们所处的环境来看，尽管与主战的载漪、载澜、徐桐、刚毅、启秀等人相比，主和派相对处于劣势，但枢臣中权力最大的奕劻、荣禄二人却倾向和平，因此被袁昶、许景澄视为可以争取的对象。[⑦] 而在外臣中，地望最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都明确反对扶拳灭洋的策略。五月二十四日，张之洞与刘坤一即联衔电奏，恳请慈禧和光绪帝“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⑧] 随后东南各督抚迭次会衔电奏，大旨均谓拳民不可恃，外衅不可启，力主保护使馆，避免邦交形势继续恶化。在这样的舆论影响下，作为张之洞的门生，袁昶与许景澄一方面与外界保持联络，将京中消息源源不断送达东南，另一方面，各督抚表现出来的态度也使他们深受鼓舞，认为京内外主和的统一战线正在结成，其谏阻当局也才更有底气。[⑨]

三、传世文献中有关袁、许上疏记录的考察

“三疏”中最早问世的第一疏，刊载时间距离袁昶、许景澄被杀的七月初三日过了七十余日。然而为学者所忽略的是，早在袁、许被处死之后的第八天，《申报》对此事进行报道，便引述北京来电称：“月初某日，许竹筼侍郎及袁爽秋京卿同时奏请剿匪，词甚恳切，不虞事被拳匪侦悉，竟要于路而戕之。”随后八月十七日《申报》又刊发《纪许袁二公被戮缘由》一文，援引

---

① 袁昶：《与外姑书》，《渐西村人日录癸》，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② 袁昶：《濑斋日录乙》，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③ 沈惟贤：《薛夫人家传》，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3 辑第 11 册“袁昶档”，大象出版社，2017 年，第 225 页。

④ 《薇柏争辉》：“升任陕西按察司袁爽秋廉访……乃帝心简在，异数频颁。……朝廷登崇俊乂，不次超迁。”《申报》1898 年 8 月 6 日。

⑤ 袁昶：《八月初六日召对恭述》，《袁忠节公遗诗·水明楼集》，宣统元年上海时中书局铅印本；袁昶：《略园相公初度》，《袁忠节公遗诗·朝隐卮衍》，宣统元年上海时中书局铅印本。

⑥ 袁允棣等编：《太常袁公行略》，光绪三十一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⑦ 载漪、刚毅等人挟慈禧太后之威而极力主战，奕劻、荣禄均为慈禧亲信，但未明确倒向主战派，本身就是态度的表现；袁昶《乱中日记残稿》所载许景澄致荣禄幕僚樊增祥书，希望樊氏能劝说荣禄助力奕劻维持邦交，可见袁、许认为奕劻、荣禄对于时局的看法应该是与自己一致的。

⑧ 张之洞、刘坤一：《致总署、荣中堂》，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3 册“电奏”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149 页。

⑨ 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张之洞档”，大象出版社，2014 年。

自京师南下者的话说："既出，复会衔上疏，不称旨，留中数日。及杨村失陷，二公复会疏……乞速诛谋臣，以冀挽回危局。疏上，皇太后震怒。"① 报道的细节间有不确，但都包含一个共同的事实，即袁、许二人曾接连会衔上疏。较此更为详细的是八月十八日《中外日报》登载的对已经安抵松江寓宅的袁昶家人的采访：

> 据云：先是五月下旬及六月中旬曾两次拜疏。首疏大旨谓义和拳能避枪炮，乃愚人自愚，大不可信……此等不法之民愈纵愈横，宜剿不宜抚。……次疏大旨谓春秋之义不斩来使，此次因乱民肇衅，攻毁使馆，不合公法……请旨保护使馆，仍以剿匪为第一要义。……迨六月下旬……遂又会衔上疏，大旨谓……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莫不信为神术，屡创不悟。今西兵日逼都下，万一不幸，其如宗社何？非剿拳匪不足谢敌，非诛主持拳匪之人不足以剿匪。疏上而祸作矣。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三疏内容的记录，距离袁、许之死不过四十余日，更较《清议报》刊载第一疏稿早了一个月有余，相比《直报》《北京新闻汇报》等刊载三疏全文更是早了三个多月。据报道这些内容系出自袁昶家人的转述，想来并非杜撰。或疑此系袁昶家人编造，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袁家于七月十二日离都，虽安抵松江，应该仍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袁昶等人做为背负着汉奸恶名被钦命处死的罪臣，当时官民仍多选择与袁家保持距离。③ 此时宣扬其连上三疏之事，对袁家而言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可能惹来麻烦，因此可以说作伪的动机不足。

袁氏家人以外，拳变时在京人员亦多有谈及此事者。袁昶的幕僚何则琳始终追随其身侧，宣统中作《挽袁渐西太常》云："燕蓟红巾蔓不图，太常疏奏尽情敷"，即指出上疏事件的存在。④ 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唐文治为袁、许属下，也记录云："四月，北京义和团祸作……大臣许景澄、袁昶上疏力争之，俱留中不报。" ⑤ 翰林院编修俞陛云与袁、许为世交，于二人被处死之际曾往诀别，亦称："拳匪之祸，丈三疏力争，横被严诛。"参与荣禄幕府的樊增祥事后写诗追悼袁、许，有句云："颜子命如鹦鹉短，元舆血溅牡丹痕"，⑥ 用了唐代谋诛逆臣而死的舒元舆的典故，虽未明言，但弦外之意可见。

京外师友对此亦多有追述。张之洞作诗悼袁昶云："七国连兵径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能为君王策万全。"⑦"帝王之道，必出万全"为晁错《言兵事疏》中语，张氏即以上疏言事被杀的晁错来比拟袁昶。郑观应也在《挽袁爽秋太常》诗中说："庸知抗疏扶危局，忠比椒山事更奇。"⑧ 又将袁昶比作明代弹劾权臣致死的杨继盛，较之张之洞的隐微其事就显豁了许多。而更为明确地道及此事的是黄遵宪，其在《三哀诗·袁爽秋京卿》中写道：

> 公官典客时，正值艰难际。初言义和拳，本出大刀会。……继言诸大国，各有白马誓。……一客不能容，反纵瘈犬噬。问罪责主人，将以何辞对？封事两留中，痛哭再上疏。……速请黄钺诛，无得议亲贵。……未知比干心，竟为直谏碎。⑨

---

① 《大臣遇害》,《申报》1900 年 8 月 5 日;《纪许袁二公被戮缘由》,《申报》1900 年 9 月 10 日。

② 《追述袁许二公遇害事》,《中外日报》1900 年 9 月 11 日，转引自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00 页。

③ 《申报》1901 年 4 月 29 日《三忠举襄记》云："回忆袁公在松江寓庐设奠之日，门堪罗雀，吊者寥落若晨星，甚至地方有司遣仆致词，谓恐招摇，以干物议。"可见未昭雪以前，外人对于袁家是唯恐避之不及。

④ 何则琳:《守黑山房诗草》卷一，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⑤ 《唐文治自述》第一编《茹经先生自定年谱正续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 30 页。

⑥ 俞陛云:《芳讯吟》,《同声月刊》第 3 卷第 7 期，第 58 页。

⑦ 张之洞:《过芜湖吊袁沤簃四首》,《张之洞全集》第 12 册，第 10578 页。

⑧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卷 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70 页。

⑨ 黄遵宪:《三哀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993 页。

此外盛宣怀等人还在《救济善会绅士公祭徐许袁三公文》中称："朝开明望，天子用咨，烈烈侍郎，侃直有词。默契帝心，浩启群疑，退复三疏，太常同之。"① 诸人皆为晚清史上重要人物，与袁昶、许景澄的关系非比寻常，若必谓皆受传说之影响而为捕风之谈，显然低估了诸人身处局中的信息掌握能力。

在官方的文件中，也同样存在着可以寻绎的痕迹。光绪二十七年初，议和代表奕劻、李鸿章等人向西安行在汇报了各国公使的意见：

> 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蒙恩将徐用仪等五员开复原官，当即恭录谕旨，照会各使。旋据该使等面称，该五员实系力驳攻击使馆，致罹大辟，代抱不平。顷据领衔葛使照称，谕旨内有数句，令人阅视，一似攻击使馆系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五员之意，按诸国大臣所阅，发钞该五员之奏折明与此语不符。……查上谕内，朝廷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徐用仪等重经一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与廷臣同。召对时所闻之语似有未符。②

随后西安行在复电称："剿抚两难语系专指拳匪而言，与攻击使馆无涉。徐用仪等亦并无力驳攻击使馆之奏，何从发钞。近来各处报馆往往捏造蜚语，耸人听闻，各使难保非见报馆所乱道，以致生疑。"③ 以慈禧为首的西安行在否认了各公使的意见，并指斥为报馆捏造。考虑到此时的慈禧犹如惊弓之鸟，对战争的责任更是推得一干二净，则对她的否认并不能给予完全的采信。且奕劻、李鸿章等人对昭雪谕旨中指责徐、许、袁等人"辞意均涉两可"的说法也提出异议，指出此与当事人闻见的事实不符。如果说李鸿章来自京外，对廷议情况不了解，而奕劻作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参与了历次御前会议，对整个事件的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若委实袁昶等人没有类似奏疏，他直接向各公使剖白即可，何必冒着触怒慈禧的风险提请覆议呢?

此外，浙江巡抚任道镕因浙江士绅吁恳，代为奏请为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建立专祠，其奏折所附公呈中提到："拳匪乱起，兵事将开，皇太后、皇上召见大小臣工，面询机宜。袁太常匍匐青蒲，敷陈剀切，侃侃不挠，为同列所叹服。继又联衔上疏，力陈匪不可恃，衅不可成，请旨饬下大学士荣禄搜捕解散，保护使臣，斡旋危局。"④ 依照清制，若袁、许果无联衔上疏之事，任道镕又何敢公然据以上奏？而以清廷对奏折用语纠察之密，又何以对此并无驳斥？这些疑问不得不引人深思。

四、关于三疏的文本真实性问题

通过上述论证，袁、许联衔上疏这个事实基本是可以成立的。但今天看到的三道疏稿，是否就是袁昶与许景澄当时的奏疏原貌，换句话说，传世三疏的文本真实性如何?

有关第一疏是否为袁昶、许景澄所作，前人已有较充分的论述，基本上肯定了该疏出自袁昶之手，但同时又认为此疏并未呈递。⑤ 否认其事者，均是根据袁昶在日记中说此折"即约竹篔于今晨同上之"，解读为准备呈递而未果。但是考察袁昶写日记的习惯，可知其为事后追补。⑥

---

① 《救济善会绅士公祭徐许袁三公文》,《申报》1901 年 4 月 27 日。

② 李鸿章、奕劻:《寄西安行在军机处》，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电报"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 34 页。

③ 王彦威、王亮辑，李育民、刘利民、李传斌、伍成泉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 9 册"西巡大事记"卷 5，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783 页。

④ 《浙抚任奏请准建徐尚书许侍郎袁京卿专祠折》,《选报》"内政纪事"，1902 年第 21 期。

⑤ 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附录"袁、许奏稿质疑"）认为许景澄本日日记中未提到联衔上折事，因此认定此折未呈递；董佳贝《两种袁昶庚子日记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亦持类似观点。

⑥ 袁昶日记手稿本中屡有已隔一段时间犹补录前时日记的情况，因此可以据此判断其记录日记的方式。如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后又补录八月下旬日记。此可参看上海图书馆藏袁昶日记手稿本。

这句话所用语态明显为完成式，且此句之后又记录了本日后续发生的一些闻见，因而可以断定是事后的记录。至于他所说的“同上之”，是直接呈递给了慈禧或光绪帝，还是交给他人代递，则不得而知。总之，对于袁昶而言，此疏是确实已经发出了。

有关第二、三两疏的真实性问题，质疑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论，今试加以辩证：第一，如戴玄之、陆玉芹等学者认为袁昶曾拒绝荣禄派他去使馆慰问的建议，因此认为他不可能写请求保护使馆的奏折。笔者认为两者之间不能构成因果联系，盖袁昶素来秉持人臣无外交的观念，而当时已下诏宣战，在未奉谕旨或邸教的情况下，个人前往使馆区与洋人会面，显然会惹来嫌疑。[①] 因此袁昶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前去，既符合当时规制，又是面对险恶情况下的人之常情。第二，认为袁昶致张之洞手札中未提及此事。今知袁昶致张之洞手札最晚的一封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而落笔最重、影响也必定最大的第三疏所上时间是六月二十七日，其书札中自不可能提到此疏。第三，认为袁昶致张之洞书札、电文用语平和，且尊称主战派诸人官衔，不似奏疏中词气激烈。今考知袁昶致张之洞电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与第三疏写作时间最为接近。众所周知，电文费用昂贵，故皆言词扼要，绝少词句铺陈及情绪渲染。且所致书者张之洞为师长之尊，于其中羼杂意见、愤愤其词，也并不合宜。但袁昶对于主战派的愤怒也是有所表现的，《袁爽秋京卿日记》六月十二日载：“今日趋衙，忿忿谬托正人而误国事者，不禁矢口大骂，实在忍耐不得”，并在《咏史诗》“徒然遵养时之贼”一语自注“陶侃骂王导语”。[②] 在六月十九日所作绝笔诗《幽愤四章》中将朝廷权臣们比作时之贼、蝮蛇、豺狼等，并引用汉代劝说皇帝禅位被诛的眭孟的典故，认为维护秩序当先诛乱臣。[③] 联系当时端王一系处心积虑欲以大阿哥代替光绪帝的勃勃野心，显然袁昶对于当权派的顽固谬妄是深恶痛绝的。况且他在六月二十三日致张之洞手札中固然尊称了各人的官衔，但须注意到手札中先说“众恶盈廷”，其后所述“端邸、荫相、崇文山师力主助拳杀夷，刚相、展如主招抚”为小字注语，是对“众恶盈廷”一语的解释。[④] 将枢臣们称为众恶，爱憎之情是很明显的。可见形势发展到六月下旬之时，斗争双方均已陷入白热化的状态，相互间是水火难容，彼此攻讦参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正如邓之诚所论：“自予观之，袁、许谋翻端、刚之议，唯有力保兵权在手，且慈眷极深之荣禄始足以折之。迨疏上不报，乃不得不严劾端、刚，以博万一之听。使无第三疏，袁、许决不至骈诛也。”[⑤] 正是基于事理发展的逻辑做出的判断。

那么，即使第二、三两疏的写作及呈递的事实可以成立，今存这两疏是否即是袁昶当时所奏的原貌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理由如下：

首先，袁昶之子袁允棣、袁梁肃、袁荣叟三兄弟谈到三封疏稿的来源时曾说：“洎先君尽节，次日住宅即为乱民与兵匪肆行焚掠……第一疏手迹仅全，余各疏稿均已仅得抄底，其未至毁失，亦幸矣。”[⑥] 考其语意，其第一疏“手迹仅全”，其余疏稿“仅得抄底”，似乎想要表达三疏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但第一疏既强调为手书，则第二、三疏显然就不是手书。今所知《袁京卿请剿拳匪遗墨》即是第一疏的手迹，对此可无庸疑，但第二、三两疏的“抄底”究竟如何，是完帙，还是片段，却语焉不详，亦从未示人。在《太常袁公行略》文后所附录三疏稿中，第一疏改题为《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题目下注云：“庚子五月二十二日。此第一疏稿，

---

① 如其早年任总理衙门章京时，对于日本公使中岛雄等人的主动纳交便因事涉敏感而刻意保持距离。

② 袁昶：《袁爽秋京卿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袁昶：《咏史》，《袁忠节公遗诗 · 朝隐卮衍》。

③ 袁昶：《幽愤四章》，《袁忠节公遗诗 · 朝隐卮衍》。

④ 袁昶：《致张之洞书》，《袁忠节公手札》，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 年影印本。孔祥吉《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一文释为“众论盈廷”，系误认，并由此大大减弱了此札的感情色彩以及与后文的逻辑关系。后来研究者对此一字之差亦多忽略。

⑤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十一），《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第 1 期。

⑥ 袁允棣、袁梁肃、袁荣叟：《致上海中外日报馆书》，袁允棣：《太常袁公行略》附录。

系照初次底稿抄出，原题急救目前危局折，旋经增润，会同许大臣奏上。其稿已失，惟此稿较石印手迹最初本又稍详。”[①] 将此疏稿的来历交代得很明确。但对于第二、三两疏，则仅署上奏日期，对于疏稿的来源未作任何交代，相比较之下不能不令人生疑，显然袁氏兄弟不能拿出确证来证明此二疏是出于其父之手。

其次，传世第二、三疏文法不甚高明，此点前人已经指出，[②] 今对照第一疏阅读，确有差距甚大的感觉。尤其第二疏中有云：

> 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于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僮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室而杀其阍人。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邻居之诘问，必不向子弟僮仆而向家主。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僮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③]

此处用了引喻设譬的方式，但奏疏一般均直陈其事，并无此类笔法，今存袁昶奏疏甚多，语言风格与此迥异。

据此可以推测第二、三两疏并非出自袁昶的手笔，但其基本内容与早期袁家人的复述大体接近，应仍是出于袁昶的思路。此外尚有一些细节，如第三疏弹劾权臣的名单相对袁昶致张之洞信中所列举主战派诸人缺载漪与崇绮之名。袁昶在六月初二日致张之洞信中明确说“天潢贵胄、弘德师保力主借拳灭洋……”此处的天潢贵胄、弘德师保尽管隐去其名，但一望而知系指大阿哥生父载漪与师傅徐桐、崇绮。[④] 然则何以单单漏掉了两人的名字呢？早年袁昶曾与邓承修谈及奏折的写作策略，“弹章则立言缓急轻重，各有所宜，国法人情，须面面都到”。[⑤] 即不敢直接弹劾载漪，以给皇室留体面，但疏文中提到“议贵议亲”，来暗指其人，盖不用明笔也。而对于崇绮，则因其系袁昶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进士的副考官，有座主门生之谊，自不能指斥其名。这其间分寸把握的隐微之处，自非当事人不办。

那么，今所见第二、三两疏究出自何人之手？沈惟贤曾明确说：“世传袁、许有三谏疏，其第一疏为袁先生手草（今有印本），第二、第三则其女夫高子衡（尔伊）代拟。”[⑥] 沈氏系袁昶的门生、幕僚，并结为亲家，庚子后与袁家同住松江，可谓关系非常密切。袁允棣等人编纂《太常袁公行略》，其审定人即包括汤寿潜、沈惟贤、高尔伊等人。以沈氏与袁家的关系，他的话应该不是凭空捏造。沈氏的女婿为袁昶第四子袁荣叟，有关情节应是从他那里得来，因此，对于沈惟贤的记录，是不应当忽视的。[⑦]

综上所述，关于第二、三疏形成的问题，其基本脉络可试加厘清：袁昶第二、三两疏并未留下全本，仅为其家人零星记忆。中外议和之后，袁昶、许景澄等人因直谏被杀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平反昭雪只是时间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宣扬袁昶的功绩，塑造其忠烈的形象，袁氏家人遂将疏稿刊行，以广流传。以第一疏留有手稿，故最早见报，且石印出版；第二、三疏则应是袁昶之婿高尔伊根据袁允棣、袁梁肃等人的复述执笔重拟。由于高尔伊本人并未写过奏章，且学问根基浅薄，因此两疏的文法与语气均未能把握精准，致有陋劣之讥，也造成后世遂由此疑二疏为伪作的状况。

---

① 袁允棣：《太常袁公行略》附录。

② 《高枏日记》所谓：“窃好事人之笔墨，博览者零杂，清真者浅快，求所谓拗折绉透者，未尝多见。至于文法，更不讲求，况持论正大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庚子记事》第 220 页。

③ 《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袁允棣：《太常袁公行略》附录。

④ 袁昶：《袁忠节公手札》，台湾艺文印书馆 1976 年影印本。

⑤ 袁昶：《渐西村人日录十一》，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⑥ 沈惟贤：《记袁磢秋先生轶事》，《人文月刊》1932 年第 3 卷第 9 期。

⑦ 沈惟贤为《薛夫人家传》的作者，理应为其提供各类信息和资料，且上疏为重要事件，按理翁婿之间也不会不谈。